

达斡尔语分支早期在蒙古语族中的地位

沙仁高娃¹, 程慧珍¹, 韦兰海²

1.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厦门 361005; 2.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在语言学研究建立的蒙古语族的多种分化谱系树中, 达斡尔语均独立构成一个语言分支或语组。此前的研究表明, 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一部分 13 世纪蒙古语的要素。本文以遗传学数据为基础, 结合历史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证据, 详细地描述了蒙古语人群始祖群体的演化历史背景, 并为蒙古语族语言早期分化、达斡尔语作为独立分支诞生的过程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演化时间框架。父系支系 M401 是蒙古语人群的奠基者父系之一, 达斡尔族的主要父系 F5483 是 M401 的最古老分支之一, 其他蒙古语人群的 M401 主要集中在另一个分支 F3796, 两个分支的分化年代约为 2.9 千年前。历史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也证明了公元 9 世纪之后迁徙到欧亚草原上的蒙古语人群与继续保留采集渔猎生活方式的亲族之间的分化。我们认为, 从多学科研究所揭示的人类群体演化历史的角度看, 达斡尔族确实可视为全体蒙古语人群的最古老分支。

关键词: 语言; 生物人类学; 智人; 蒙古; 达斡尔语

Early position of the Daur language branch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group

SHAREN Gaowa¹, CHENG Huizhen¹, WEI Lanhai²

1.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21002

Abstract: According to previous linguistic work, the Daur language was categorized as a separate language or cluster in nearly all classifications of the larger Mongolic language group.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many elements of the ancient Mongolic language in the 13th century are found in the modern Daur language. Here, based on evidence from genetics, history, ethnology, and linguistics, we explored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ancestral group of Mongol-speaking populations and provided an accurate timeframe for the early differentiation of Mongolic languag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Daur language as a separate branch. Y-chromosome lineage M401 is one of the paternal founding lineages of all Mongolic-speaking populations. The

收稿日期: 2021-01-07; 定稿日期: 2021-09-18

基金项目: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东北亚地区语言演化及其与人群混合历史的相关性研究”(20BYY195)

作者简介: 沙仁高娃,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研究。E-mail: sarengaowa.good@163.com

通讯作者: 韦兰海, 副教授, 主要从事演化语言学、语言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研究。E-mail: Ryan.lh.wei@foxmail.com

Citation: Sharen GW, Cheng HZ, Wei LH. Early position of the Daur language branch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group[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22, 41(6): 1037-1046

dominant paternal lineage of Daur, F5483, was one of the oldest sub-branches of M401, while most of the M401 individuals from other Mongolic-speaking populations belong to another lineage, the F3796 or other major sub-branch of M401. These two sub-branches differentiated at about 2,900 years ago. Studies of history, ethnology, and linguistics also revealed a permanent separation between Mongolic tribes who dispersed across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 and their relatives who remained as hunter-gatherers in the forest since the 9th century. In terms of demographic history, Daur is indeed the oldest branch of all Mongolic-speaking populations. We suggested that the multidisciplinary evidence, especially that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supports the early branching of the Daur language from the Mongolic language group.

Keywords: language;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Homo sapiens*; Mongol; Daur language

1 蒙古语族的谱系分类

蒙古语族是“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之一，分布很广。现代的蒙古语人群是 11 世纪以后室韦 - 蒙古人群扩散与演化的结果。学者们认为，蒙古语族各语言是由一种共同的、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的原始蒙古语发展而来^[1]。就蒙古语族的分类而言，目前学界普遍认同九分法，即将蒙古语族分为达斡尔语、布里亚特语、蒙古语、卡尔梅克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和莫戈勒语。喻世长、清格尔泰、陈乃雄等学者均持此类观点^[2-5]。此外，还有方言论、六分法、七分法、八分法、十分法、十一分法以及世界语网站（www.ethnologue.com）的分类法等^[5-12]。纵观以上所有的分类法，达斡尔语始终作为独立的语言存在于蒙古语族之中，构成一个单独的分支或语组（图 1）。

1.1 蒙古语诸人群和达斡尔族的起源历史

根据史料记载，蒙古族族称来源于额尔古纳河下游的“蒙兀室韦”部^[13-15]。现代蒙古语人群可以追溯到室韦部落，其核心人群则源自于北室韦部落（可能是钵室韦和婆菟室韦）。公元 9 世纪中期，随着回纥汗国的崩溃及许多突厥语部落的西迁，大批室韦人西迁至蒙古高原和阴山地区，与留在蒙古草原的突厥语人群混合。在迁徙的过程中，草原上的蒙古语人群经历了从采集狩猎生活方式向游牧生活方式的转变，语言、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地区的诸多部落后，形成了“蒙古”的民族共同体^[16,17]。

达斡尔族的起源历史尚不清晰。明代后期的史料中首次出现关于达奇鄂尔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达奇鄂尔人群就是后世的达斡尔族^[18]。达斡尔人在明代后期的居住地位于蒙古语人群分布区域的东北部边沿地带。清代以后，他们逐渐从黑龙江中上游北岸内迁到今天的居住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扎兰屯市、阿荣旗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区、梅里斯区、富拉尔基区、龙江县、富裕县、嫩江县、瑷琿县等地）。根据历史学的研究，13 世纪以后蒙古人在欧亚草原上扩散并成为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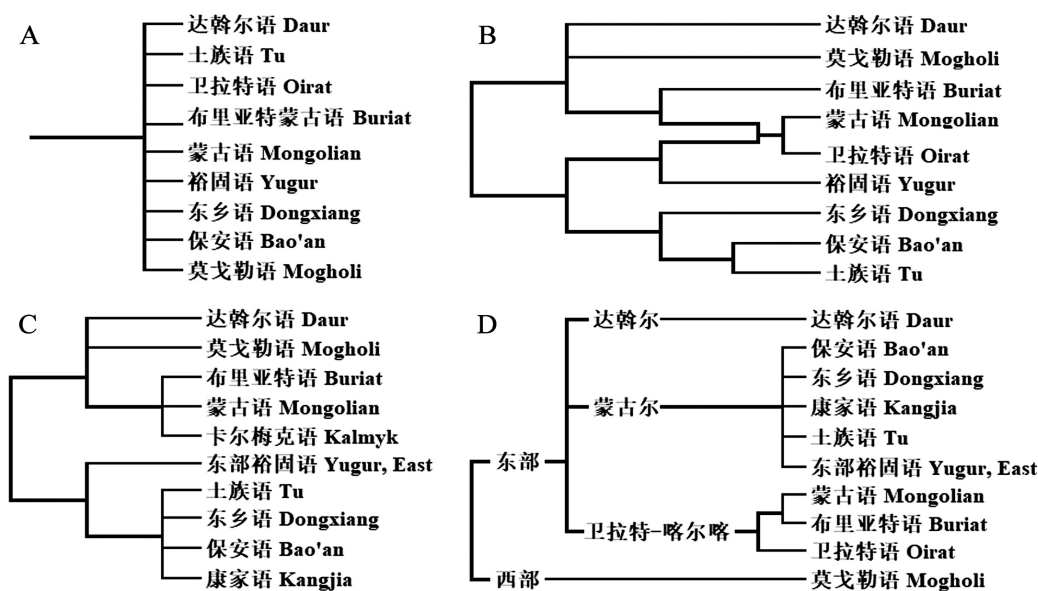


图 1 语言学研究构建的蒙古语族的语言谱系树

Fig.1 Classification of Mongolic languages as revealed by linguistic studies

A. 引自 [5-10]¹⁾; B. 引自 [1]; C. 引自 [11]; D. 引自世界语网站 [12]

牧人群的典型代表,而明代末期的达斡尔族仍保留着比较浓厚的采集渔猎生活方式,因此,达斡尔人可以被认为没有迁到草原上而仍留在大兴安岭北部至外兴安岭之间的密林中的那部分北室韦部落的直接后裔。关于达斡尔族族源的讨论目前主要集中在契丹后裔说^[19-25]和蒙古同源说^[26-30]两种。考虑到达斡尔族的演化历史以及明末清初的分布情况,我们较为赞同蒙古同源说。

1.2 达斡尔语中的古代蒙古语因素

《蒙古秘史》为我们了解 13 世纪蒙古民族及成吉思汗时代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氏族部落制度、民俗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最原始和准确的资料。同时,书里记载的古蒙古语音、词汇、语法等相关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也极有价值。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和乌云达赉等学者对《蒙古秘史》词汇的词源和含义进行研究,发现有很多词汇需要借助达斡尔语的词汇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解释^[31-34]。也说明达斡尔语中仍保存着 13 世纪的古蒙古语的很多古老成分,并且当时已经在使用。在阐述达斡尔语为何能解释《蒙古秘史》中的部分难解词时,阿尔达扎布先生认为:“后来蒙古人走出森林,与其他民族接触后,经济、政治、语言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这样 13~20 世纪的几百年里,语言有了很大变化。而居住在原地的达斡尔族,与外族接触较少,所以得以保留了古老的生产生活、民俗和语言。”^[32]有学者认为,这一事实揭示了在更早的历史时期这两个民族的祖先有过的同源关系^[35,36]。

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蒙古秘史》和达斡尔语的词汇进行了一些对比。

1) 早期的分类法(如六分法、七分法或八分法)大多只区分语言种类,较少对上位的谱系结构进行讨论。

1) 一些词汇与采集渔猎生活方式以及相关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有关。在蒙古人的祖先从采集渔猎生活方式转向游牧生活方式之后, 这些词汇不再使用, 而是使用了其他的词汇来指代相应的事物(表 1: 1) [32]。

从表 1 中的“山丹根”“小鱼儿”“黑鸦名”“狩猎”“百灵鸟”“朱顶雀”等词的对比可以看出, 达斡尔语不但是保留了这些词汇, 而且含义指向很明确。这些词汇大致是采集渔猎生活中常用的词汇。对于迁徙到草原、转向游牧生活方式的其他蒙古语人群来说, 这些词汇不再是必需的, 因此逐渐消失了。

2) 《秘史》里的一些词汇, 现代达斡尔语中还在使用, 但现代蒙古语中已经看不到了, 原因不甚明确。在解释《秘史》里的一些难解词汇时, 现代蒙古语无法理解, 而需要借助达斡尔语词汇才得以理解(表 1: 2) [31-34]。

3) 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 部分词汇虽然还继续沿用, 但词义有显著的改变(表 1: 3)。

如表 1: 3 所示, “多卜兀勒^中忽 dobtulqu”一词在继续沿用, 但在以狩猎采集生活为主的达斡尔族中着重突显狗的狩猎作用, 而在游牧生活方式中则突显的是马的作用。

“巴塔赤罕 batači qan”, qan 即汗。这个词汇的意思不是“(一大群)牧人的汗”, 而是“(自身作为)猎人的汗”。可见, 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了这个词的词义改变。

“安达 anda”, 在达斡尔语里侧重“狩猎盟友”, 而在现代蒙古语中已无“狩猎”的含义, 只有“盟友、朋友”之意。

远古时期, 蒙古族和达斡尔族都是北部室韦部落的后裔, 他们的祖先共同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麓至黑龙江中上游北岸的地区, 同属于一个人群团体, 生活方式和所身处的自然环境相近。蒙古人扩散到草原之后, 与其他人群发生了大规模的融合, 生活方式从采集渔猎转向游牧, 经济、政治、语言等方面也相应地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旧词汇也因不适合新的环境而被新的词汇替代。而居住在原地的达斡尔族与其他人群的接触较少, 古老的生产生活、民俗和语言得以保留了下来 [32, 35-37]。

综上, 语言学家采用多学科视角的研究方法, 从词汇释读的角度论证了达斡尔语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早期分支地位, 认为其保留了很多其他蒙古语中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语言要素。并结合了历史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调查的研究成果, 指出经济方式及生活环境的变迁是导致达斡尔语与其他蒙古族语言发生分化的最根本原因。本文以群体遗传学的人群动态演变过程为基础, 从生物人类学的角度, 对达斡尔语的演变过程及分支地位进行再讨论。

表 1 词汇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vocabulary

《蒙古秘史》Words in <i>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i>	达斡尔语 Words in modern Daur language	现代蒙古语 Words in modern Mongolian language	汉语释义 Meanings in Chinese
1) 札兀 ^中 合速 jauqasu (名词)	jōgos	替换为: saran-a	山丹根
木速惕 müśü (名词)	müs	替换为: iš. müśü 现代蒙古语词义转变为“冰、人品”	箭杆
只 ^舌 刺木惕 jiram-ut (名词)	jaram	替换为: zigasu	小鱼儿
兀纳昆 ünügün (动物名)	ünükün	替换为: isige	山羊羔
^中 合 ^舌 蓝伯 qarambai (动物名)	harampa	替换为: nugas	黑鸭名字
巴塔赤 bataha'uluni (动词)	bataal, batačin	替换为: angčin	狩猎

续表 1 词汇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vocabulary (Continued)

《蒙古秘史》Words in <i>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i>	达斡尔语Words in modern Daur language	现代蒙古语Words in modern Mongolian language	汉语释义Meanings in Chinese
秃兀巴tu'uba (动词)	tögü (保留着tū的动词活用形式)	替换为: buuh	落下
毕勒都兀儿bildu'ur (动物名)	bildür、bieldür	替换为: hairguqi	《秘史》: 告天雀儿 达斡尔语: 百灵鸟
秃牙勒tuyal (动物名)	togyl、togiel	替换为: biljuuxai	《秘史》: 群鸟、雀群 达斡尔语: 朱顶雀、山雀
2) 弩nu (名词)	Noo; no	替换为: öncüg	隅、角
纳温na'un (名词)	Noon; non	替换为: hüü	儿孩、男孩
贴 ^𠂇 兀格兀 ^𠂇 terge'ur (名词)	Tergütü; terwül	替换为: zam	车路、路
只勒答jilda (名词)	diald、dialla	替换为: oroi	晚、迟
忽泥huni (名词)	Honi; oni	替换为: utaa	烟
浑讨兀huntau (名词)	huntoo	替换为: gai	祸、厄运
斡弩赤onuči (名词)	onči	替换为: hutag	剃箭扣的小刀
粘别额nembe'e (名词)	nembee	替换为: hučih	盖
米纳阿mina'a (名词)	mina	替换为: tasuur	鞭子
撒 ^𠂇 刺兀 ^𠂇 儿sara'ur (名词)	sartüül	替换为sar; sartüül在现代蒙语意思为“敞亮”	月亮
米跌 ^𠂇 里周mideriju (动词)	midelgu	替换为: ösgölji	踢
摆亦 bai-i (动词)	bai	替换为: zogs; bai在现代蒙语里失去了“站立, 停止”的词义。	站立、停止
哈兀勒周ha'ulju (动词)	haolji	替换为: dobtulqu	奔着
孔牵küngken (动词)	künkeen~künkeeki	替换为: dutaah	逃出
忽兀秃该hü'ütügei (动词)	üütgei~hüütgei	替换为: yalzarhai	臭烂着
蔑勒毡meljen (动词)	meljeen; meljen	替换为: zörtüü	不服、倔强
跌格温degetün (介词)	degetün	替换为: deegütür	上经过
捌乞周čokiju (动词)	čokiju	替换为: doyih	啄
阿兀a'u (形容词)	au	替换为: orgon	宽阔
巴 ^𠂇 鲁阿纳察baru'an-ača (形容词)	baraan、baran	替换为: oln	多处; 众多
阿纳anu (代词)	anii	替换为: tüüni	他的
安都 ^𠂇 儿andur (代词)	aand、ande	替换为: tüün nai	他们的
亦马宜imayi (代词)	yamai; yami	替换为: tüüni	将他, 把他
亦呐inu (代词)	inii	替换为: ter	他的; 给他
巴ba (代词)	ba	替换为: bid	俺
安 an (代词)	an; aan	替换为: ted	他们
亦马阿 ^𠂇 里ima'ari (代词)	yamaar、yamar	替换为: tüün er	《秘史》: 因他的; 达斡尔语: 从他那儿、比他
^𠂇 哈(勒)塔斯haltas	haltag	替换为: hagas	半个, 一半
3) 多卜兀勒 ^𠂇 忽dobtulqu: 冲的	dobtolgü或dortolgü	Dobtulqu (骑马奔腾、转义: 野兽的猛冲)	
安达anda: 契友	and (狩猎盟友)	Anda (友伴、盟友、结拜兄弟), 无“狩猎”之意	
巴塔赤罕 batači 突厥语意: 牧人, 因此解释为“牧人”或“狩猎”	bataal狩猎; batagü; 打猎	消失	

2 一些基本方法论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借助于现代人的精确谱系和古 DNA 数据的更新发展,生物人类学已经可以揭示人群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详细演化历史。在人类群体演化过程中,人群的各类属性都在同时发生变化,包括 DNA 所反映的人群遗传结构、人群体质特征和人群各种文化传统(含生产生活方式、语言的各种要素、使用的器物以及心理、宗教、哲学和世界观等等)的变化。从其自身来讲, DNA 和语言的演变本质上是完全独立的两套系统;但从宏观的角度看,两者都代表了人群某类属性的变化,可视为人类群体演化过程这一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人群的扩张、迁徙、接触和融合也是语言分化、隔离、接触与混合的重要动因。人类遗传学研究所揭示的人类群体演化历史过程,可视为人类文化和社会属性的种种因素发生演变的背景。由于资料匮乏,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很难分析无文字资料时期的语言演变过程。将生物人类学的证据加入传统的演化语言学研究,在精细的人类群体演化历史背景之下分析远古时期语言的形成和早期演变过程,有望形成新的演化语言学研究方法。不过, DNA 演化规律和语言演变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还需要进行很多理论方面的探索。

可用于研究人类群体演变历史的生物学遗传学标记主要分为四类,包括体质形态、经典遗传学标记、常染色体 DNA、母系线粒体 DNA 和父系 Y 染色体 DNA。体质人类学通过比较不同人群之间的生物性状(测量性状和非测量性状)的差异,研究人群的起源和演化历史。不过,由于人类体质的演化较为缓慢,在对人群演化历史进行研究时,体质测量数据能提供的信息量比较少。数十年前,经典遗传学标记(如各类血型、抗原和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曾被用于人群演化历史方面的研究。DNA 测序兴起之后,基于经典遗传标记的研究已经非常少见。常染色体 DNA 占人体 DNA 的绝大部分,是所有祖先的遗传信息混合的结果,因此,基于常染色体 DNA 可以精确地评估人群混合的比例。

加入古 DNA 数据后,则可以准确地还原出自远古以来始祖人群经过不断的分化和混合形成现代人群的过程。由于常染色体 DNA 每一代都发生重组,因此对演化过程的时间分辨率比较低。而母系线粒体 DNA 和父系 Y 染色体 DNA 的大部分区域严格遵守母系或父系的单系遗传规律,因此可以用于构建可靠的文化谱系树。母系线粒体 DNA 也有一定的族群特异性,但其大约每 2000 年产生一个新的突变,对人群演化历史的分辨率比较低。在目前经常被研究的约 1700 万个碱基对的区域内,父系 Y 染色体 DNA 大约每 70 年诞生一个新的可靠突变,这个时间间隔相当于两代男性的世代间隔。父系 Y 染色体 DNA 不断在积累新的突变,极易产生族群特异性和男性家族特异的父系支系。另一方面,父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形态。总之,父系 Y 染色体作为时间分辨率最高的遗传标记,可以成为研究人类群体演化历史的强有力工具。

使用父系 Y 染色体进行研究主要有五个步骤。首先,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采集一定数量受试者的血液或口腔拭子样本,并记录相关信息(特别是家族起源相关的信息)。之后,进行 DNA 测试,分析数据,整理各支系的比例,构建谱系树并计算分化时间。在

这一步骤中, 来自其他人群的参考数据是获得较好分析结果的关键。其次, 结合研究对象群体的相关研究成果, 对获得的遗传学数据进行全面分析, 解读人群的起源和演化历史。样本的代表性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是决定研究结果准确程度的主要因素。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 通常 30 个以上的无亲缘关系样本就可以代表群体的遗传结构的主体部分。具体到本项目涉及的达斡尔族人群, 要求: 样本总数需在 30 例以上; 受试者的三代祖先都应属于本族群; 受试者之间要排除三代之内的亲属关系。前期研究涉及的 121 例男性, 来源于达斡尔族 18 个主要哈拉部落(相当于一个姓氏家族)中的 16 个, 包括阿尔丹哈拉、敖拉哈拉、卜克图哈拉、德都勒哈拉、鄂尔特哈拉、鄂嫩哈拉、郭布勒哈拉、何斯尔哈拉、胡尔拉斯哈拉、精奇里哈拉、克音哈拉、莫日登哈拉、苏都尔哈拉、托莫哈拉、沃日哈拉和乌力斯哈拉等。我们认为这些样本足够代表达斡尔族父系遗传结构的主要部分。通过与现有研究数据相比较, 可以从达斡尔族的父系 DNA 测试的结果中分辨出不同于亚洲其他地区人群类型的遗传成分。这些成分的来源包括: 1) 清代以后我国东北及华北地区人群; 2) 不同时期的通古斯语人群; 3) 亚洲北部类乌拉尔语相关的人群; 4) 黑龙江流域旧石器时代的罕见成分; 5) 达斡尔族独有的成分。剩下的部分是蒙古语人群共同始祖群体共享的成分, 即 C2b1a3a1-M401 (“星簇”) 和 F1756。在研究达斡尔族从蒙古语人群共同始祖群体中分化出来的过程时, 父系 M401 可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而在研究达斡尔族自身的复杂演化和混合历史时, 所有父系类型都是研究对象。

语言是划分族群的最关键要素之一。数十年来, 有学者使用生物进化树的算法模型和软件对人类语系的演化时间框架进行了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果, 但这种方式只能研究那些在群体遗传结构中留下可追溯痕迹的语言演化过程。而父系 Y 染色体本身的突变规律导致很容易形成具有族群特异性的父系支系。首先, 对于具有同源关系的人群而言, 往往拥有同一种或者多种共享的父系类型。这种父系类型通常经历过晚近的、强烈的分化和扩散, 而这一过程与此类人群的演化历史是大致同步的。其次, 这种父系类型在此语系或语族之外的人群较为少见, 因此我们称具有上述特征的父系类型为这类人群的“奠基者父系类型”。对一个人群(或人群集团)的奠基者父系的分化过程进行研究, 可以解析这个人群(或人群集团)的演化历史的主体部分。再次, 古代人群和现代人群的遗传结构都是高度混合的。人群的分化、隔离和混合都可以在父系 Y 染色体上留下痕迹。只有先识别出奠基者父系之后, 才能更好地分析其他父系类型在人群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总之, 父系 Y 染色体可以成为人群和语系演化历史的强有力工具之一。

此前, 其他领域的学者对人类遗传学的数据应用于演化语言学的研究有较多的顾虑, 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此类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尚未建立起来, 二是对人类遗传学数据的分辨率是否足以解决非常精细的问题这点存疑。对于第一点, 本文尝试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 对于第二点, 本文对父系 Y 染色体 DNA 具有的较高时间分辨率有进行阐释。人类的语言和遗传成分的演化是两套独立的系统, 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值得从理论和具体实例两个层面开展深度研究。群体遗传学研究能够为人群演化过程提供较为清晰的演化时间框架, 这些结果可以成为研究人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演化过程的关键基石。

3 蒙古人和蒙古语早期分化的群体演化历史背景

从 2010 年开始, 为了研究蒙古语人群的起源, 我们广泛地收集了北亚地区人群的样本, 进行了一系列的人类遗传学研究。通过对样本的测试和分析, 构建父系 Y 染色体分化谱系树, 并计算其分化年代。C2b1a3a1-M401 (“星簇”)、M407、F1756 和 F6170 是蒙古人群最重要的四个奠基者父系类型, 各自反映了不同的演化历史。在达斡尔族中, 父系 M401 被认为是最核心的父系类型, 而 M407、F1756 和 F6170 三个父系在达斡尔族中几乎没有发现。可见, M401 是达斡尔族和其他蒙古语人群之间唯一共享的奠基者父系类型。在莫力达瓦和呼伦贝尔地区的达斡尔族中收集了 200 例样本, 其中男性 121 例。通过 Y-STR 测试, 推测共有 29 例 M401, 占 23.97%, 是比例最高的父系类型。从这 29 例中挑选 11 例进行 Y 染色体全序列测试, 确定属于 M401 类型并获得了可用于构建谱系树的序列数据。此前, 学者基于这些数据发表了关于达斡尔族的群体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论文^[38]。现在, 我们整合已发表的数据, 为父系 M401 重新绘制了带有分化年代谱系树, 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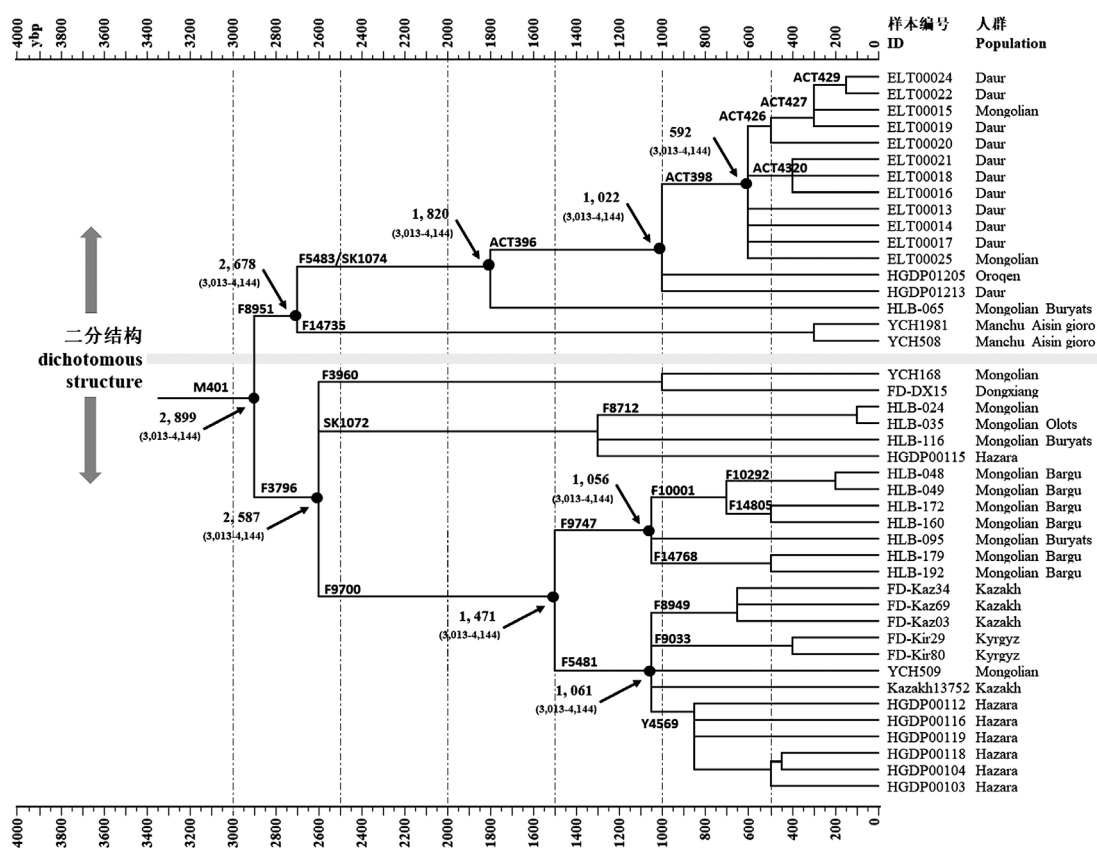


图 2 父系 M401 的谱系树和分化年代

Fig.2 Genealogy and differentiation age of paternal M401

注: 谱系树线条上的字母加数字为父系染色体遗传标记, 箭头左侧为分化年代 (单位为年), 分化年代下方括号中的小字表示分化年代的置信区间, 上下坐标轴上的数值表示距今年代。

目前, 已经测到的所有 C2b-M401 支系样本的共祖年代只有约 2.9 千年, 其在距今 2.9 千年~2.6 千年之间发生分化, 诞生了后世存在于满族(以爱新觉罗氏为主)、达斡尔族和其他蒙古语人群的三个主要下游父系分支(F14735, F5483 和 F3796)。达斡尔族支系 F5483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分化出了 3 个支系; 而在距今约 600 年前, 支系 F5483 经历了急剧的扩张, 短时间内诞生了很多个下游支系, 形成了现代达斡尔族人的独特支系 ACT398。

我们认为, 父系 M401 谱系树的拓扑结构、分化时间和达斡尔支系的早期分化地位, 与全体蒙古语人群的起源和扩散历史十分吻合。根据前文所述, 在 9 世纪之后古人类迁徙到草原上的人群转向了游牧生活方式, 演化为后来的蒙古诸部。在 12-13 世纪之后, 蒙古部兴起并在欧亚大陆上发生大范围的扩散, 形成了今天的蒙古语人群。在此过程中, 仍有一些北部室韦部落留密林之中, 保持了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 他们可能是后来的达斡尔族的主要演化源。到了明代后期, 首次在史料中有达斡尔人(达奇鄂尔)的记录, 其群体大致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北岸。达斡尔族的祖先与其他蒙古语人群在古老时期的生物学父系谱系上的分化这一观点, 得到了父系遗传数据研究结果的支持。可以认为, 9 世纪之后的历史进程是达斡尔族始祖与其他蒙古语人群最后一个阶段群体意义上的决定性分化, 此后, 达斡尔语与其他蒙古语族开始了不同的演化方向。

依前文所见, 父系遗传结构研究所揭示的群体演化历史过程, 可以支持达斡尔语在全体蒙古语族诸语言中的早期分化地位的观点, 也为蒙古语族诸语言的起源和早期分化过程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演化背景和较为准确的时间框架。我们推测, 在距今 2.9 千年~1.2 千年, M504 及其下游支系是室韦部落(特别是北室韦诸部)的主要父系类型。在这一阶段, 他们仍然生活在临近的地理区域, 都以采集渔猎生活方式为主; 但是, 蒙兀室韦的语言与达斡尔族祖先的语言分化是否已经发生、到达何种程度等, 尚待深入研究。据此可知, 2.9 千年是现存全体蒙古语人群的共祖时间的上限; 公元 9 世纪之后的大范围扩散时期, 可以认为是达斡尔语与其他蒙古语开始发生分化的时间; 蒙元时期, 可以认为是达斡尔语与其他蒙古语发生分化的时间的下限。

4 结论

结合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和遗传学的证据, 我们描述了早期蒙古语人群共同始祖群体的分化、迁徙和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 并发现达斡尔族人的核心父系类型确实是全体蒙古语人群核心父系之下的最早分支; 认为在公元 9 世纪之后, 大部分古代室韦部落扩散到草原上、改变了经济生活方式, 其语言面貌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留在大兴安岭北麓及黑龙江中上游北岸的其他古代室韦部落则延续旧的生活方式, 因此其语言保留了更多的古代蒙古语的因素。我们认为, 上述人类群体演化历史背景, 完全支持现代达斡尔语在蒙古语族中的早期分化地位, 并能在群体演化过程方面给出很好的解释。

参考文献

- [1] 司提反·米勒.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言语法比较研究 [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 [2] 喻世长. 论蒙古语族的形成和发展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 [3] 清格尔泰. 蒙古语族 [A] 见: 清格尔泰文集 (第 9 卷) [C]. 赤峰: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227-237
- [4] 陈乃雄. 我国蒙古语族语言研究概况 [J]. 民族语文, 1987(4): 7-16
- [5] 德力格尔玛, 波·索德. 蒙古语族语言概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1-3
- [6] 符拉基米尔佐夫. 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 [M]. 译者: 陈伟.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7] 桑西耶夫. 蒙古语比较语法 [M]. 译者: 陈伟, 等.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59
- [8] 鲍培. 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 [M]. 译者: 卢弼.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 (油印本), 1979
- [9] 那森柏, 哈斯额尔敦, 等. 现代蒙古语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82
- [10] 斯钦朝克图. 康家语研究 [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 [11] 孙宏开, 等 (主编). 中国的语言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2] Eberhard D, Simons GF, Fennig C, et al.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24th edition) [M]. Dallas, Texas: SIL International, 2021
- [13] 亦邻真. 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 [A]. 见: 亦邻真, 齐木德道尔吉, 等. 亦邻真蒙古文学集 [C].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447-510
- [14] 莉·列·维克托罗娃. 蒙古人: 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 [A]. 译者: 陈弘法. 见: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 (编). 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 (新编第 38 辑) [C].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 1985, 1-77
- [15] 王斑. 室韦的族源和各方位 [A]. 见: 王巍、孟松林 (主编).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 (第二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146-155
- [16] 清格尔泰. 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及其研究 [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85(4): 18-28
- [17] 本书编写组. 蒙古族简史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7
- [18] 本书编写组. 达斡尔族简史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 [19] 陈述. 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 [J]. 民族研究, 1959(8): 41-48
- [20] 沈汇. 论契丹校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起源 [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4): 50-57
- [21] 刘凤翥. 从契丹小字解读探达斡尔为东胡之裔 [J].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2(1): 36-39
- [22] 满都尔图. 达斡尔族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1
- [23] 吴东颖. 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研究 [D].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999
- [24] 孟志东、毅松. 达斡尔族简史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 [25] 巴图宝音. 达斡尔族源于契丹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26] 箭内互. 元代经略东北考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 [27] 阿勒坦噶塔. 达斡尔蒙古考 [A]. 见: 达斡尔资料集编委会. 达斡尔资料集 (第二集)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8, 6-38
- [28] 钦同普. 达斡尔族志稿 [A]. 见: 达斡尔资料集编委会. 达斡尔资料集 (第二集)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8, 172-211
- [29] 何维荣. 达古尔蒙古嫩流志 [A]. 见: 达斡尔资料集编委会. 达斡尔资料集 (第二集)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8, 128-171
- [30] 池尻登. 达斡尔族 [A]. 见: 达斡尔资料集编委会. 达斡尔资料集: 第二集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8, 240-335
- [31] 阿尔达扎布. 新译集注《蒙古秘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 [32] 阿尔达扎布. 在达斡尔语中使用着而在现代蒙古语中已消失了的 <蒙古秘史> 词汇 [A]. 见: 敖拉·乐志德 (主编). 达斡尔资料集 (第八集)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1222-1233
- [33] 阿尔达扎布. 蒙古秘史还原注释 (蒙古文) [M].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0
- [34] 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 等. 《蒙古秘史》词汇选释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 [35] 景爱. 达斡尔族论著提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36] 巴达荣嘎. 达斡尔语、满洲语、蒙古语的关系 [A]. 见: 达斡尔资料集编辑委员会,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 (编). 达斡尔资料集 (第七集)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559-569
- [37] 巴达荣嘎. 达斡尔语与古蒙古语的比较研究 [A]. 见: 达斡尔资料集编辑委员会,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 (编). 达斡尔资料集 (第七集)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584-589
- [38] Wang CZ, Wei LH, Wang LX, et al. Relating Clans Ao and Aisin Gioro from northeast China by whole Y-chromosome sequencing [J].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19(8): 775-780